

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
著



典藏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王瑶
著

中古文学史论

典藏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古文学史论：典藏版/王瑶著. —4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301-24016-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167 号

书 名：中古文学史论 (典藏版)

著作责任者：王 瑶 著

责任编辑：徐丹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016-8/I·273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126.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282 千字

1986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版 2008 年 5 月第 3 版

2014 年 5 月第 4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小引

纪念一位学者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读他的书。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是“书比人长寿”。筹划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我提议从王先生众多著作中选一本书，精校精刊，让其更为长久地流传下去。师友们聚会商议，一致推选《中古文学史论》。

除了这书很“经典”，值得苦心经营；还因此书引用大量古籍，每次重排重印，在减少若干错漏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讹误。当初只是预感与推测，经过一番认真校勘，发现确实如此——今天北大版的不少错讹，棠棣版并不存在。

此书的版本情况如下：1951年8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刊行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史论之一》收文五篇，《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史论之二》收文四篇，《中古文学风貌——中古文学史论之三》收文五篇，这原本就是一书，只是因“时值建国之初，私营出版社顾虑较多，不愿出字数较多之学术著作，故循其所请，一分为三”（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1956年9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中古文学史论集》，从上述三书中选文八篇，加上《关于曹植》和《关于陶渊明》两篇新作。1982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此书时，又添上了《读书笔记十则》。大陆之外，则有香港中流出

版社于1973年分别重印棠棣三书；1975年，台湾长安出版社又将三书合成《中古文学史论》行世。至于石川忠久、松冈荣志所译之《中国的文人：“竹林の七賢”とその時代》，收文四篇，由东京大修馆书店1991年出版。

1986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横排本《中古文学史论》，棠棣三书终于在作者的授权下合璧，且做了认真校订。王瑶先生在该书《重版题记》中称：“此次重版，虽经作者就全书重行校读一遍，并有所补正，但总的来说，它仍然是一部旧作”；“在付印过程中，又蒙钱理群、陆彬良二同志协助核校，多所匡正，并此志谢”。作者本人对此版本非常重视，也比较满意。日后北大1998年版、2008年版虽改变了版式，也修订了若干错误，但大致仍属于1986年版系列。

王瑶先生去世后，众弟子与友人同心合力，先后刊行了七卷本的《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和八卷本的《王瑶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其中第一卷均收入了《中古文学史论》。《编辑说明》称：“1986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古文学史论》，将棠棣版三册合为一书，并作了认真校订。此次刊行，采用最能体现作者原初意图、讹误较少的北大版《中古文学史论》，同时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中古文学史论集》的《自序》和《重版后记》。”由于此书征引古籍繁多，即便这两个出版社的编辑尽心尽力，重排本的错漏也在所难免。

不客气地说，随着此书版本的增加，遗憾只能是越来越多。因为，作为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著作的校对难度往往被低估了。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一个比较权威的“定本”或“典藏版”。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抹杀1986年北大版的贡献。从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还增加了棠棣版欠缺的书名号（原未加书名线），工作量

其实很大。更何况，钱、陆二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做了不少校订工作。正因此，王先生才刻意在《重版题记》中致谢。

选择最能代表王瑶先生的眼光、学养、才情与学术个性的《中古文学史论》来制作典藏版，最初曾设想直接采用棠棣版重印，后来发现不行。原因是，1986年北大版在整体结构上合并棠棣三书，可在具体文本的选择上，又采纳了不少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的修订版。在《〈中古文学史论集〉自序》中，王先生称：“经过了这几年来的学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内容不妥之处很多；因此又抽暇重新整理了一下，删去了约三分之一的文章，把其余的也都作了一些修改，合为一册，就是现在这本《中古文学史论集》。”这里所做的修订，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高压，而是学术及文章方面的考量——校正了不少错漏及若干破句，还就文章结构做了一些调整，比如《玄言·山水·田园》一文便删去了论述陶渊明的三页多（与此版收入《关于陶渊明》有关）。而王先生“重行校读一遍并有所补正”的1986年版，这一章用的是删节本，而没有恢复棠棣版。

其实，之所以提出为这本不无遗憾的“经典之作”校订引文，很大程度是托现有各种古籍数据库的福。否则，工程极为浩大，很难下这个决心。这回的具体操作过程是：先请北大出版社提供电子文本，由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高恒文教授将每段引文与数据库相比对，列出所有差异之处；再由我一条条分辨，看是否需要改动，以及如何改动。我的工作原则是：能不改的地方尽量不改，需要校改的地方，尽可能出校注。只有一种情况，我径直改过来，那就是棠棣版并没有错，是日后各版的纰漏。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少，大约有七八十处（含标点及字句）。至于为何不嫌麻烦，出了二百三十多处校记，不是炫耀博学，而是基于对前辈学者的尊重。作者引古籍时使用的版本，与

今人普遍阅读的“整理本”不同，不该以今律古，随意更改。不好擅自改动，可又希望体现学术的发展，于是采用了多出校记的办法。

整个校订工作的原则及方法，如哪些改、哪些不改，怎么改，如何标示等，参见书前的《校订说明》及书后的《校勘所据书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标点符号的使用，顿号、逗号、分号还是句号，长句还是短句，感叹还是疑问，所有这些标示，因时且因人而异。对照今天各种权威的整理本，本书出现差异而不作改动的，有两三百处。基本想法是，只要不破句，就尊重作者的习惯。至于若干短句，作者虽加了引号，但没注明出处，尽管与经典文本略有出入，以其无伤大雅，也就不做校改了。

高恒文教授和我都不是古典文献专家，虽然尽力而为，修订的地方不下五百处（这里也有责任编辑徐丹丽的功劳），但因学识及精力所限，实在不敢夸口“完善”。

最后，我谨代表王先生诸多入室弟子，特别感谢为制作此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而施以援手的高恒文教授，以及不计工本多次刊行王先生著作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平原

2014年3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校订说明

本书以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中古文学史论》为底本，参校1951年上海棠棣出版社《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以及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中古文学史论集》、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中古文学史论》。此次的工作目标是：校订所有引文，而凡属作者论述部分，除非明显的错别字，否则不做任何改动。用来核校的古籍版本，见卷末附列之《校勘所据书目》。

棠棣版竖排繁体，没有书名号；上海古籍版横排繁体，同样没有书名号；1986年北大版改简体字横排，加书名号。此次校勘，凡棠棣版没错而日后各版出现的错误，径直改过，不出校记。

今人引用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多据中华书局1959年整理本，故称《三国志·魏书》等；而王瑶先生书中均作《三国志·魏志》等，亦无误。因各种版本不同，为了尊重历史，不做改动。

古书的句读与标示，没有一定之规，往往因人而异。作者引古书时，只要不破句，则尊重个人习惯，不强求统一。

作者加引号而未注明出处之句，虽与经典文本略有出入，然因属读书人耳熟能详的名句，大意不错，也保持原貌，不做校改。

引文中出现通假字，若不致引起误解，虽与今日通行本不同，亦不改。

其余的改动，一律出校记。原则是：凡明显错误，称据某书某版某页校改；可商量之处，则列出某书某版某页的相关文字，供读者参阅。之所以不擅做定夺，是因为无法判断作者当初使用的版本。

书中的修订符号，以〔〕表示拟改，以〈〉表示拟补，以{}表示拟删。

重版题记

本书属稿于1942年至1948年期间，书名即称《中古文学史论》，是作者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程的讲稿。其写作意图及经过已详书中所附之初版《自序》及《后记》中，不再赘述。1951年作者曾以之分别编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时值建国之初，私营出版社顾虑较多，不愿出字数较多之学术著作，故循其所请，一分为三，其实仍为一书。1956年，“运动”之风渐紧，乃自我从严处理，将全书整理修改一次，删削几半，改题《中古文学史论集》，交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荏苒多年，久未重印。迨“史无前例”之时代结束以后，天晴日霁，科学研究又迈新步，上海古籍出版社乃于1981年据1956年纸型，重印一次。后知香港中流出版社曾于70年代据棠棣出版社本，重印过《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又承日本石川忠久教授主持，将《中古文学思想》及《中古文人生活》二书中多篇文字，予以选译，改名《中国之文人》，列为日本大修馆书店所出《中国丛书》之一，在日本出版。又由于近年来学术思想活跃，各地治中国文学史之同道及同学，也时有询及棠棣版三书者，认为尚具有某种参考价值，亟宜重

印；今岁访日，又蒙日本同行学者予以关心与鼓励；感愧之余，遂拟仍照原先计划，将棠棣版三册合为一书，仍名《中古文学史论》，予以重版。承北京大学出版社热心协助，遂得付梓。对于来自各方之盛情支持及鼓励，作者深为铭感。在付印过程中，又蒙钱理群、陆彬良二同志协助核校，多所匡正，并此志谢。

学术研究工作总是在前辈学者的哺育和影响下起步和前进的。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受到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指导，已于初版《自序》及《后记》中叙及，这是一种“亲承音旨”式的当面讨论的方式；此外受到前辈著述的启发和影响的地方，尤其众多，我这里只想谈谈鲁迅著作对我的教益。由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鲁迅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的研究，长期以来作者确实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这不仅指他对某些问题的精辟的见解能给人以启发，而且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著作以及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鲁迅把他拟写的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关于“酒”和“药”同文学的关系我们已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得知梗概，“女”和“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

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这些现象既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同文人的生活 and 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文学史的历史特征的。又如他把唐代文学的一章定名为“廊庙与山林”，那是根据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对现实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加以概括的，其意盖略近于他的一篇讲演的题目《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目的是由作家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来考察作品的不同倾向。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的，至少作者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的。但由于自己理论修养和学术水平的限制，几十年来不仅始终停留在“心向往之”的阶段，而且还常常发生东施效颦的现象，本书各文就具体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作者所以愿意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本书质量不高，还可能存在某些错误或不妥之处，但作者深信自己所遵循的思路和方法还是比较对头的，而且仍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并对过去的失误有所弥补。

此次重版，虽经作者就全书重行校读一遍，并有所补正，但总的说来，它仍然是一部旧作。由于多年荒疏，作者未能对论述内容做出新的探讨和增补，至感内疚；但本书所论述的都是一些比较专门的学术问题，也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和提出了个人的看法，或者仍可供今天的研究者与学习者以参考，因此决定重版，并希望由此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教正。

1984年12月10日于北京大学镜春园寓所

初版自序

苏轼《韩文公庙碑》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愈自己也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是古文家的态度。清刘逢禄有《八代文苑》，陈崇哲有《八代文粹》，陆奎勋有《八代诗揆》，张守有《八代诗淘》，王闿运有《八代诗选》，又都是以“八代”为宗尚的。本书所讨论的各问题的时代，起于汉末，讫于梁陈，大略相当于旧日所谓八代的范围。名为《中古文学史论》，是沿用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的习惯称法，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我们和前人不同的，是心中并没有宗散宗骈的先见，因之也就没有“衰”与“不衰”的问题。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昔人之所以常用“八代”、“六朝”这些字样，也正表示出这四百多年的文学史是有它底共同时代特征的，是一个历史的自然分期。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

本书共十四章，大致是分三个范围论述的。第一部分是“文学思想”，着重在文学思想本身以及它和当时一般社会思想的关系。第二

部分是“文人生活”，这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着重在文人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文学风貌”，是论述主要作家和作品内容的。不过这只是大致的说法，因为这三部分都互相有关联；而且如果要分开，这书中每章都可自成一单元，但因为又是有计划写的，所以合起来也颇具系统。不过为了出版家和读者的兴趣，照着大致的范围分为三部分，也有一种方便，所以就这样分开了。本书开始属稿是在1942年秋天，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年了。其中《隶事·声律·宫体》一章曾在《清华学报》刊载，《小说与方术》一章曾在商务出版之《学原》刊载，《拟古与作伪》及《论希企隐逸之风》两章曾在《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刊载。又于1946年及1948年度曾先后以此书为蓝本，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程。在出版之际，作者对以上各刊物的编者和清华大学，皆深致谢意。

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全书成后，又请余冠英先生从头校阅过一次，指正的地方也很多。对于这些奖掖帮助的厚意，作者敬在此一并致谢。

1948年6月7日于北平清华园寓所

目 次

001	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小引 / 陈平原
005	校订说明
007	重版题记
010	初版自序
001	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
032	玄学与清谈
059	文论的发展
090	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
111	小说与方术
142	文人与药
173	文人与酒
197	论希企隐逸之风
220	拟古与作伪
239	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
258	潘陆与西晋文士
273	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
295	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
323	徐庾与骈体
352	初版后记
356	校勘所据书目

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

在政治史上，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汉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后南北朝底更长久的分裂。汉末的离乱，是由东汉中叶以来多年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底病态腐蚀所演变成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农村破产，政治腐化，权力集中在少数的外戚宦官手里，都是促成统一局面崩坏的因素。所谓黄巾之乱，实际上即是藉宗教迷信而团结起来的农民起义；此后的盗贼四起和军阀割据，其直接原因皆为社会经济的破产。《后汉书·张让传》云：“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后汉书·刘陶传》云：“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客观基础，所以一些野心家收集流亡者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割据

势力很容易；但养活这些士众却非常困难。《晋书·食货志》云：“魏武之初，九州云扰，攻城掠地，保此怀民，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赢蒲。”董卓之乱，把洛阳变成了“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1]”；长安变成了“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在这种情形下，北方的富庶地带，都弄得道路阻塞，农民流徙，到处都是盗贼，形成了社会秩序的大破坏。中央政府无力控制政权，灵帝时遂改刺史为州牧，握有地方军政实权，于是各州牧豪右都藉机扩充势力，自保一方。想法戡定境内的“盗匪”，抚绥人民就业。这些所谓“盗匪”本是饥民难民的流亡结合，很容易起来，但本身还没有一定坚强的组织和统一目标，所以也很容易下去。于是渐渐地由盗贼的横行，变成了军人的割据。这就是建安时代的局面。

这些割据的军阀中，有许多即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刘表为八俊之一，统治荆州，定五经章句，为一般名士所依归。袁绍四世三公，母丧后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盛况不下陈实。又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都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2]。”谢车徒，以单车归家。这些人所以能够割据一方，汉末以来的刺史握有军权固然是原因；但更重要的，士族的集团和地位的确立，是这段历史的一大枢纽。经过了长久的汉帝国的升平局面，士大夫不但在政治上有了巩固的优越地位，在经济上也享有厚禄，可以收买土地，把持一方；退休后便是地方的豪绅，死后便留给子孙，还是照样做官。帝王的提倡儒学，博士弟子的加多，都给他们的地位加了保障。这样，便慢慢

[1] 据中华书局 1959 年版《三国志》第 1099 页。

[2]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后汉书》第 2234 页作“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